

SHEHUI ZHUYI | JIHUA JINGJI DE LISHI HE
LILUN QIYUAN

任晓伟 著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的历史和理论起源



人民出版社

SHEHUI ZHUYI | JIHUA JINGJI DE LISHI HE
LILUN QIYUAN

任晓伟 著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的历史和理论起源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阮宏波

版式设计:程凤琴

封面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历史和理论起源/任晓伟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

ISBN 978 - 7 - 01 - 007829 - 8

I. 社… II. 任… III. 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经济-研究

IV. F0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2888 号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历史和理论起源

SHEHUI ZHUYI JIHUA JINGJI DE LISHI HE LILUN QIYUAN

任晓伟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635 毫米×927 毫米 1/16 印张:21.75

字数:274 千字 印数:0,001 - 3,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07829 - 8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怎么产生的？它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有何历史必然性？真正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全面客观地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以及如何顺利地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义非同一般。晓伟这部著作，正是针对这些问题，依据十分丰富的文献，经过几年深入、反复的思考、论证，回答了这个问题。

晓伟是我的博士研究生，是我历届博士生中最少让人操心的学生。他有极高的自觉性和对科研由衷的热情和兴趣，他对问题的分析和看法同他为人一样实实在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历史和理论起源》这部著作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我赞成他的论文出版，原因是论文本身的内在价值，并不是为了他评职称的需要，他已被评上副教授了。

最初在确定这个选题的时候，导师组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认为这个选题的分量比较重，难度也相当大。计划经济的问题是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理论研究中的显学，但自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后，计划经济的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关注了，除了一些零星的文章外，看不到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新的集中系统的思考和研究。是不是对计划经济的研究在我们改革的时代就没有意义了？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主观建构出来的，也不是靠着数

理逻辑推导出来的,它只能是从计划经济这个既定的前提出发,通过改革形成的社会主义新体制。忽视对计划经济的研究,忘记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改革的历史起点,改革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就得不到正确的理解。这样看来,研究计划经济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历史现象,而且是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即便是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作为一个历史现象,也不是说人们对它的认识已经穷尽了,进一步的研究没有必要了。

在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曾给晓伟反复说到,能不能把这个问题做好,关键的问题是能不能搞清楚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究竟是怎么来的。比如,很多人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结果,那么,这个“化”是怎么发生的,这恐怕不是一下子就能说清楚的。观念性的东西对历史发展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在观念的背后应该说还有更为重要的历史因素在推动。而要研究清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形成这个问题,前提是首先要弄清楚计划经济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一般理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据事前确定的中央计划来配置经济资源的一种体制。这样一种理解,逻辑上没有什么毛病,但却很难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过去我们所熟悉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五年计划三年半完成”的现象似乎与所谓的事先确定的中央计划很难联系在一起,因为计划一直在变动。此外,有些时候,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根本就没有什么计划,或者虽然有了计划却一改再改,难以执行。这些现象都是对计划经济的通常理解所无法解释清楚的。所以这个研究的核心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什么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怎么来的。

这部著作在系统深入阐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历史起源和

理论起源的基础上,针对着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只看做是对马克思论断的照搬、或只是对社会经济资源的行政配置、只是落后国家工业化需要,甚至看做是一种历史“迷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内涵作出了自己的界定,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对社会经济资源的一种政治配置,这种配置本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理论支撑下与强制工业化和集权政治相适应的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是在转变社会发展路线以及由此引起的意识形态、产权结构和政治体制出现整体性制度变迁的基础上解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结果,并不是对计划经济的简单抛弃。书中还在令人信服地分析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前提下,说明不能一谈到计划、国家宏观调控和行政干预就当成向计划经济回归的模糊观点。

在论文评审和答辩时,专家们给了比我作为论文指导教师高得多的评价,甚至感叹多年来已没有读过这么好的博士论文了,认为论文抓住并解释清楚了所研究的基本问题,提供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起源的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解释,而且许多观点和看法与人们习以为常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值得认真思考。比如,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制度性内涵的解读,把“一战”期间的德国战时计划经济看做为苏联计划经济的历史原点,对新经济政策内在矛盾及其与苏联计划经济的确立之间关系的分析以及对20世纪40—50年代中国通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历史道路的分析等,特别是文中的第三部分,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起源这一部分,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变迁、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和生产资料部类优先增长的原理三个视角对维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理论元素的形成和固化过程的分析,显示出作者独特的观察问题的视角,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深入的学习和研究,

是形不成这样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能力的。

晓伟在写作这部著作的过程中阅读和消化了大量的文献，这部著作中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和扩展性的问题很多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这本身表明这个研究在多年的时间里经受住了学术的考验，也是对他辛苦钻研的一种回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要不断深入下去，确实需要一代一代的人，特别是青年人，能够进入这个研究领域，能够在这个领域中静下心来，坐下来，钻进去。

黄宗良

2007年12月19日于北大住所

目 录

序	(1)
绪论	(1)
一、相关概念的说明	(1)
二、争论中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	(3)
三、研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起源的意义	(19)
第一章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制度性内涵	(22)
一、研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制度性内涵的必要性	(22)
二、传统社会主义改革时期关于计划经济认识的理论演进	(28)
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制度性内涵	(43)
第二章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历史起源	(51)
第一节 20 世纪初社会主义者关于计划经济的认识与“一战”期间德国的战时计划经济	(51)
一、20 世纪初社会主义者关于计划经济的认识	(52)
二、德国工业化模式的历史特点与“一战”期间的战时计划经济	(59)
三、“一战”期间德国的战时计划经济对列宁的影响	(68)
第二节 战时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从理想到现实	(76)
一、战时共产主义:概念的再认识	(76)

二、战时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的历史内容	(80)
三、战时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中的理想和现实	(92)
第三节 列宁时期新经济政策的内在矛盾和苏联社会主义计划 经济的确立	(103)
一、列宁时期新经济政策的三重内在矛盾	(104)
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与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确立的历史前提	(121)
三、布哈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建构与苏联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确立	(133)
第四节 通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中国道路	(141)
一、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说与 关于战后中国市场化道路的理论设想	(142)
二、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说与 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观的形成	(147)
三、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的内在矛盾和中国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的确立	(156)
第三章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起源	(168)
第一节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 理论解构	(168)
一、计划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	(169)
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意识形态理论	(172)
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国家理论	(175)
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扩大再生产理论	(178)
第二节 “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182)
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中的意识形态	(183)
二、十月革命后列宁、布哈林、康德拉季耶夫对资本主义	

发展的认识	(186)
三、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瓦尔加、斯大林对资本主义 发展的认识	(194)
四、“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204)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变迁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210)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的国家和社会主义	(210)
二、20世纪初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认识分歧	(216)
三、十月革命后俄共国家理论的发展	(223)
四、斯大林的国家理论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234)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242)
一、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及其意义	(242)
二、列宁关于生产资料比消费资料优先增长的理论及 十月革命后苏联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探索	(251)
三、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理解和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	(263)
第五节 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特点	(271)
一、对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学习	(272)
二、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中的反教条主义特点	(275)
三、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中的“泛政治主义” 特点	(277)
第四章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衰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	(281)
第一节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衰落	(281)
一、生产和消费的冲突	(282)
二、政治和经济的冲突	(285)
三、理论和现实的冲突	(287)
四、官僚理性和历史理性的冲突	(288)

第二节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传统社会主义改革道路的结构性特征	(291)
一、传统社会主义改革道路的结构性特征	(291)
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	(293)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道路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解构	(303)
一、当代中国改革的制度背景	(304)
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道路的形成	(306)
三、传统社会主义改革的结构性特征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319)
结论 历史和理论再认识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323)
参考文献	(327)
后记	(337)

绪 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苏东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计划经济作为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最为显著的制度性特征逐渐消退了,而市场经济这一过去长期以为已经被超越了的发展形式又重新成为了后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道路。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留下的既定前提,无论对苏东后社会主义转型来说,还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而言,计划经济客观上构成了其不可易移的历史起点和制度背景。因此,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对计划经济进行反思内在地决定着我们在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中如何“经常自己批判自己”^①,这种“批判”极大地影响着我们对自己正跋涉于其间的道路的历史性理解。

一、相关概念的说明

本书试图以20世纪20—30年代的苏联和40—50年代的中国这两个“内生型”的计划经济国家为研究对象,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从历史、理论的视角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生成的历史过程及其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理论逻辑变迁过程,并通过20世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8页。

90年代前传统社会主义改革的分析,提出一个以“结构性约束”为核心概念的关于传统社会主义改革史的理论分析框架。关于本书的研究主题,有三个基本概念首先需要解释。

第一个是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个概念。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所现实形成的计划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而之所以还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提出来,并不是试图再去论证这种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就要实行这种计划经济,而主要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即这种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在制度和思想上的结合,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一个客观的政治经济现象。因此,研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起源其实就是试图寻求对这种客观现象形成的一种历史主义理解。

第二个是关于“起源”这个概念。“起源”这个概念有“起点”、“原点”的含义。从字面上说,似乎应该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起源归结到某一具体的历史和逻辑点上去。但是,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现象来说,很难把它们归结到一个具体的历史和逻辑原点上,它们的起源往往是许多不同因素互相作用、互相促动的复杂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起源应该被看做是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相互结合的一个过程。历史起源就是不同历史因素结合的过程,理论起源也不能直接等同于理论来源,而应该是作为不同历史因素抽象反映的不同逻辑因素相互作用、相互结合的过程。

第三个是关于“内生”这个概念。这个概念表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苏联和中国的确立根本上是由自身社会发展的内部因素所推动的,与在外部因素推动下形成的计划经济(比如,东欧的计划经济主要是作为苏联为了控制东欧国家而推广苏联模式的结果,而且东欧国家的资源禀赋条件也不可能使其计划经济具有内生的可能性)是不同的。这里主要涉及一个如何理解中国对苏联模式学习和移植的问题。这种学习和移植是在中国通往计划经济的道路上呈现出来

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但它只有与中国自身的内在因素结合在一起时才能表现出来,并呈现出结构性的稳定和产生持续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苏联模式的学习和移植只是加速了推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确立的因素在中国历史条件下的聚合。因此,我们把苏联和中国一起看做“内生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当然,这并不影响对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起源过程中的具体历史和理论特点的分析。

二、争论中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除了一些零星的学术论文外,很少有人再集中系统地研究计划经济的问题,但绝不能由此说,重新认识计划经济的问题就消失了。事实上,无论是在对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的研究中,对社会主义思想史和发展史的研究中,还是在对社会主义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关于计划经济的认识以不同的方式作为自觉或不自觉的前提大量渗透在人们对当前现实问题的思考之中。

在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之前,人们在分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形成时,往往把原因归结到社会化大生产上,认为计划经济的确立是对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矛盾的克服,因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严格地说,这一认识不是哪一个人的学术观点,而是反映了整个一代人的普遍认识,甚至是常识性的理论观点。^①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这一观念的形成,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形成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不再简单地把它看做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制度需要。一般而言,现在人们强调得比较多的是

^① 参见邓明发编:《计划经济学教程》,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

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即以这种计划经济为制度特征的苏联模式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与苏联特殊的历史条件结合的产物。^①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因素,即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照抄照搬。^②但在这个基本的认识之下,人们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却并不一致。

关于计划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大致有三种截然不同的认识。第一种观点认为这种计划经济本身在理论上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强调斯大林的计划经济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设想。^③第二种观点认为,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并不符合经典作家们关于计划经济的理论设想,并不是对经典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计划经济,前者以国家主导下的行政指令为主,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计划主体则决不是国家行政体系。由此,应该说,是斯大林的经济理论直接导致了苏联高度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模式的形成。这样,问题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错误,而是运用者的错误。^④因此,有人强调:“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思想如果实行起来自有其技术上的困难,但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从没

^① 参见黄宗良、孔寒冰编:《世界社会主义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322页;陆南泉、姜长斌等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页。

^② 参见马凯、曹玉书编:《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3—74页;陈甬军:《中国为什么在50年代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③ 参见张传平:《市场逻辑与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9、129页;沈宗武:《斯大林模式的现代省思》,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刘日新:《计划工作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邓力群编:《五十年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4页。

^④ 参见李崇富、姜辉编:《马克思主义150年》,学习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6页;薛汉伟、王建民:《制度设计与变迁——从马克思主义到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215页;宋光华编:《当代中国经济》,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蒋学模、张晖明:《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总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有实行过。要是我们在研究中还尊重诚实和公正的话，便不能简单地要它为后来在它的名义下发生的事情负责。”^①第三种观点则试图把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归结为一种空想社会主义，认为计划经济所涉及的对生产关系、对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来解决资本主义危机以及对产品经济的错误理解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物。有人则把这种空想性具体归结到俄国民粹社会主义的影响上，认为十月革命后，虽然信奉民粹社会主义纲领的社会革命党解散了，但民粹社会主义思潮并没有消失。从斯大林开始，苏共领导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染有民粹社会主义的色彩。^②

在对特殊历史条件的理解上，人们的认识也是有分歧的。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强调落后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面对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试图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历史要求，在实践中这一要求转化为一种强制工业化的发展道路。这样，就可以把计划经济理解为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加速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产物。这一点在苏联和中国都是一样的。^③如果说，这是对“特殊条件”的

^① 张光明：《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

^② 蒙一丁：《计划经济模式的空想根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4年第3期；奚广庆：《苏联解体与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③ 参见武力：《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和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5页；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何帆：《传统计划体制的起源、演进和衰落》，《经济学家》1998年第2期；张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联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7页。也有论者在这个意义上强调了苏联和中国计划经济的不同，认为苏联由于受到工业文明和市民社会传统的影响，其计划经济“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而中国的计划经济“更多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参见秦晖：《中国改革：历史与伦理的评价》，《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1期；《转轨前中东欧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可放弃性”问题》，《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一种内在性理解,那么,另一种观点则从外在性来理解这一“特殊条件”,即在资源硬约束的条件下,由于外部威胁和对战争的担心引起了社会行为主体的道德化,从而使得国家有必要也有可能把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纳入了计划经济的轨道。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其他“计划经济”国家,只有这两个条件同时形成时,才能开辟出通往计划的道路。^①当然,这两种观点往往是互相支撑的,它们体现出来的认识差异并不具有实质性。

在计划经济的评价问题上,人们的认识上也是不同的,这反过来又反映出人们在计划经济形成问题上认识的分歧。关于计划经济的地位,实质上涉及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条件下如何评估计划经济的制度价值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本身并没有错,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纯计划经济只有在共产主义阶段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在历史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原来“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变成了“空想经济”或“官僚主义经济”,它本质上已不再是计划经济了。但是,不能由此对计划经济持彻底的排斥态度,应该反思的是如何认识和建立科学的计划经济体制,“恢复计划经济应有的本质规定”。而随着科学水平的提高,已经有可能使“计划由空想变为科学”。^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企图固守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没有出路的,不仅在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不应该实行计划经济,而且就是在将来生产力发展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了,计划经济就更不应该也更不可能实行了。从计划经济的内在结构看,它最本质的矛盾就是计划的指令性和个人消

^① 参见盛洪、张宇燕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44—62页。

^② 参见夏兴国、田东山:《论计划经济体制的兴起与衰落》,《江汉论坛》2001年第2期;候廷智:《为“计划经济”正名》,《前沿》2002年第8期;张尧学:《重新审视计划调节的作用》,王东京编:《中国经济观察》2004年第1辑。